



学习鲁迅札记

林 焕 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学习鲁迅札记

林 焕 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学 习 鲁 迅 札 记

林 焕 平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首团结报印刷厂印刷

*

1984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字数：173,000 印张：9.5 印数：1—4,350

统一书号：10109·1688 定价：0.84元

目 录

鲁迅印象记	增田涉(1)
鲁迅与日本	增田涉(45)
鲁迅与日本白桦派	(73)
日本白桦派及其三位主要作家	(97)
鲁迅与夏目漱石	(119)
关于鲁迅逝世的三封信	增田涉(135)
尼采艺术论抄	(144)
怎样阅读鲁迅的杂文	(158)
鲁迅的小说	增田涉(221)
《伤逝》的艺术特色	(231)
《野草·题辞》和鲁迅的思想飞跃	(242)
父子之情	高田淳(250)
甘为孺子牛	高田淳(257)
鲁迅研究杂谈	(267)

鲁迅的读书方法和研究方法.....	(278)
学习鲁迅精神 发扬鲁迅精神.....	(290)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广西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后记.....	(299)

鲁 迅 印 象 记

增田涉

鲁迅怎样指导我学习和翻译他的作品？

最初同鲁迅相会时的印象如何呢？如今已记不清楚。那个时候，如果是一时的旅行者，同鲁迅只见过一两次面，那么，到如今也许还能鲜明地记忆着他当时的音容笑貌。但是以后一直都是每天和他接触，经过十个月，所以，第一个印象自然就消失了。

最初，我以向鲁迅学习的心情，每天到内山书店去，等候鲁迅的到来。我向他请教：学习中国文学，要读哪些书？他就给我他的著作《朝花夕拾》。我在旅馆里读了这本书，不懂的词句和内容，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去请教他。这本书是回忆他幼年和青年时代（以及留学日本时期）的生活，书中也回顾了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在其中的他的幼年的梦。他的用意，是要从外国来学习中国文学的我，首先了解中国的生活风习吧。这是一本不足两百页的书。不用一周就读完了。跟着，他给我以他的散文诗集《野草》。虽说是散文

诗，却不是抒情的东西，而多是寄寓着政治上的激烈的忿怒。他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呢？我对于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缺乏充分的知识，因而我是不能领会它的真正意义的。只是由此了解：眼前的瘦削的、脸孔苍白的他，是能够有这种沸腾的强烈的愤怒感情的人。

其次，开始请教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问题。由于一开始就是准备翻译这本书（这是内山完造的推荐），他就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讲解。这时，就不是在内山书店里，而是直接到鲁迅的家里去了。在内山书店“漫谈”一下，就同他一块儿到附近的他的寓所去了。我们两人并坐在他的桌子旁边，我将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读成日本译文，读不下去的就请教他，字句、内容不清楚的，就彻底问清楚。他的回答，如果是字句的解释，是简单的；如果是内容，需要种种说明，就费相当的时间。大抵是从午后二时或三时开始，到下午五时或六时为止。其中，有时也夹杂一些杂谈，或听他对每日发生的时事的意见和批评。约费三个月，才讲解完这本书。当时，由于白色恐怖，他几乎断绝与外界的来往，没有什么客人来。在宽阔的书房兼应接室里，只有广平夫人在稍为离开一点的地方做她自己的工作（或读书，或抄写，或编织衣服；孩子海婴，都是由保姆带着到外面玩去了，很少在家）；所以，我能很少受到干扰，接受讲解。看许寿裳编的《鲁迅年谱》，这是根据鲁迅日记编的，一九三一年七月的一条，有“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完毕。”句。（追记：看

后来出版的《鲁迅日记》，七月十七日，记有“午后，为增田君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完毕。”）完成了这件工作时，我松了一口气，他也松了一口气吧。随后，《呐喊》、《彷徨》这两部小说讲解完时，已是这一年的年末了。这一年，春夏秋冬，每天都在他的书斋里，每天约三个小时接受他的个人讲授。许广平夫人每天以点心和茶接待，每周有两回在他家里吃晚饭。他的确是诲人不倦地、手把手地给我以谆谆教导。我感谢他所给我的恩情，真是无法以语言来形容的。

鲁迅，活在我的心里

浮在我脑际的鲁迅，决不是或则教训、或则说教的，可怕的，使人疏远的人；而是和蔼可亲，完全可以信赖，能知无不言地亲切地谈话，一点也没有给人以威严的感觉。作为朋友，我们的年龄很不相同；作为教师，却又不觉得那样的敬畏。总之，是一个平易近人，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讲给你听的人。从文章来看他，是面孔有几分可怕的、威严的人。实际上，我日常接触的他，是一位很好的伯伯，留着黑黑的胡子，有幽默的神态。奇丽澄澈的眼睛，连一点微尘都没有。走路的姿态，仿佛是飘飘欲仙似的。

他夏天穿着中国服。但在我眼里，印象最深的他的姿态（在室内所见），却是他穿着黑绒的学生裤，系着皮带，穿着紫色的毛线衣，头发和胡子蓬松的长着，手里经常拿着烟

斗，嘴巴一字地收拢着，有时哈哈地发笑。由于不常去理发，衣着又随便，所以，有一次，他到一座大厦的七楼去拜访一位英国人，中国的电梯工人以为他样子态度古怪，赶他“往那边走！”没有办法，他只好一步一步的从楼梯走上七楼去了。尽管如此，他也并不生气，笑嘻嘻的讲话，他的态度、脸孔，常常是无所谓的样子。他香烟不离手。由于吸便宜的纸烟，手指头烧成茶褐色。由于久久才理一次发，所以一旦理了发，人就完全变了样似的漂亮，我也就以“漂亮”笑他。

他的鼻子不高，稍为向上仰着。最近，鲁迅的侄女（周建人的女儿）周晔（在我常到鲁迅家里去的期间，周建人常常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来玩，所以我也见过周晔，但样子忘记了）写回忆伯父鲁迅的文章，说过这样的事情：

她孩子的时候，比较过伯父和父亲的鼻子，伯父的鼻子同父亲的鼻子不同，而是看来比较低的，伯父和父亲的脸孔却是很相似的，只是鼻子不似。她以这样的疑问问鲁迅的时候，鲁迅回答说：“你不知道，小时候，伯父的鼻子和你父亲的鼻子是相同的，但是伯父不知多少次地碰壁，就把鼻子碰低了。”又说：“伯父的周围经常是很黑暗的洞穴，因为太过于黑暗了，所以很容易碰壁。”

周围经常是黑暗的洞穴。在黑暗的洞穴中碰着鼻子走路——这是用很巧妙的比喻说明了他的生涯。有人说，他的文学都是写黑暗的事情，这不外是因为他的周围是黑暗的洞穴

的缘故。如果不越出这黑暗的洞穴而脱身，就只有一边在壁上碰着鼻子，一边从里面敲坏这个洞穴了。这就是他的生涯。

鲁迅的性格是诚实的。他喜欢认真的人。有一个时候，他曾同一位倾向甚为不同的青年作家共事，问他为什么同那个人一起工作？他说他比其他的人认真。他最爱认真、诚实。他不喜欢什么都不干，懒懒散散的人。他自己勤奋地工作。他热心地编辑杂志，校订友人的翻译。他说，人什么都不干是最不好的，……虽是罗马帝国的暴君，也比什么都不干的人好。生在世上而无为，是最没有意思的。所以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欺人之谈，他很憎恶。他不喜欢作这种无为的说教的老子。在《出关》这篇小说里，他就把老子戏剧化。……这是他对无为思想的批判。他极力提倡勤勉努力。他认为埋头苦干是最重要的。这是他对中国人的强烈要求。他自己也是这样实行的。据我所知，他每天只休息六个小时，他正午前起床，到第二天的黎明都在读书或写文章。有一次，深夜二时，我路过他居住的大楼，其他所有的窗户都熄灯睡觉了，只有他的房间，还是灯火明亮。先生还在用功哪！我一边心里很感动，一边仰望着他的窗口。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在深夜用功，这给年轻而懒惰的我以很强烈的激励。

当然，这也不是鼓励任何时候都伏案埋头工作。他的弟弟建人先生常常来访，一块儿去看电影。他弟弟是公务人员，

一天到晚过着被束缚的生活，所以有时不能不去玩玩，休息休息。看电影，我也大抵一块儿去的。看写实影片、记录影片或根据文学作品摄制的影片。有时也出去看美术展览会。回来时，也到咖啡馆去。我还记得他又曾对我说，你不想跳舞厅去看看吗？于是同许广平夫人一起三人到舞场去看了。喝着啤酒，看了一会儿，他说无聊，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他也曾买了票，一块儿去看中国人表演的西洋歌舞，他也说肉麻，开幕不到五分钟就回来了。

有一次，在鲁迅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喝了一点酒，他轻松愉快起来了，看着食桌上摆着的五、六种菜，说道：

“我过着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并不感到有趣味。因为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

甚至还说到，在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他曾同绿林人士来往，同过粗野生活的事情。

山本初枝夫人，是很了解鲁迅的。她说，鲁迅曾对她说过：“我曾做了绿林汉子，若说他们的事，我很了解哩。”这是有几分讲笑话，但那个时候的他，恐怕是把他们当做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同他们取过联络吧。

于是，鲁迅又进而说：

“攻击我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当是已经被杀害了。现在还活着写文章，说三道四，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我也承认这个理由。我们从反清革命以来，我的朋友大抵被杀了，

活下来的很少呀！”

不仅是反清革命运动，北京的“三·一八”事件以后，他往南方去了；晚年他居住在上海租界，也是实践着人“一定要生存”的信条。①

“三·一八”之后，同许广平一起，在从北京南下的途中，在南京的旅馆里，受到孙传芳的军队的检查。在一件行李里面，收藏着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不幸那些士兵打开了放着党员证的行李了。鲁迅对我说：“那个时候感到完蛋了。但是那些军人们尽翻到行李的底面去，而党员证却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在最上面，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我说：“如果发现了，会杀头吗？”他说：“大概会杀头吧，那个时候发现国民党，一般是杀头的哩。”②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就任教职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他是被目为有急进倾向的教授，过着深居的生活。那个时候，有人来访问他，侦探他的“思想”。鲁迅就海阔天空，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什么安德烈夫论呀，杜斯托益夫斯基论呀，等等，用这些言论来迷惑和愚弄这些愚蠢的侦探，使他们捉不住向长官汇报的要领。林语堂在文章里写

①这里，可以参考恩格斯1873年2月12日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信里的话：“至于说正是在我们有可能靠过去的著作得到钱的时候，要我们把它几乎全部无偿地提供给你们，那末请你不要忘记，我们也需要钱：第一，要生活；第二，要补偿日益增加的鼓动和宣传作品的开支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89页）

②这是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合作，积极准备北伐的时候，军阀发现国民党是会杀害的。

过这样的事情，我问过鲁迅，有这样的事情吗？他说：“有过这样的事呀。实在他们是没有当侦探的资格的傻瓜。”我说：“那些侦探是学生吗？”他说：“是学生，但是什么都不懂，就是当了反动派的爪牙的家伙罢了。说是学生，也是已经变坏了的奴才了。我还在学校出入的时候，是一个人居住的，别无其他任何人，他们就时时来威胁了呀。可是我不怕威胁，我习惯了。有时，他们拿拳头来威胁我，我想，反正是政治流氓，就打了那些学生，于是他们就逃走了，哈哈哈……”

上面的鲁迅的话，记在我在上海所写的《鲁迅传》的初稿里，如今还是这么写着。《鲁迅传》是以我当时亲自从他听到的事情为基础写成的，又是请他过目了的。在这些话之后，在原稿里，还有鲁迅的如下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常常在枕头底下放着一支手枪。”但鲁迅用铅笔把这句话涂去了。象是预想到会发表而删去似的。但是，我是从他嘴巴里听到，才写下来的，不是全无根据，随便写下来的。他是不想发表吧。为了防卫生存权，他懂得如何战斗。作为这样的插话之一，我如今把这件事发表在这里。

往往有人向我询问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结婚或恋爱关系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没有听到什么。我曾经问过他，但也搞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听到特别有兴味的回答，就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种种问题都曾经请教过鲁迅。在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事件中，他们二人都

被北洋军阀政府所追捕，就一块儿南逃了。因此，某些人就散布谣言，恶意捏造二人的关系，说鲁迅拐带许广平潜逃，两人就同居了等等。鲁迅对我说，到那时为止，他们都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有这样的谣言，感到很讨厌，就索性同居了。他是以平时的谐谑的调子，天真地这样说的。大抵是年龄不同，以师生的情谊相结合的。据我了解，他们是逃避迫害，在共患难的环境中结合的。在把结婚认为是重大事情的人们听来，也许这是不很满足的答案。但是我只懂得这么多，也没有进一步去询问的兴趣。我自己那时也已结婚了，而且也是由父母之命而简单结婚的。所以，对于那样的事情，并不那样的关心。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夫人尊称鲁迅为“先生”，鲁迅则称她为“密斯许”，仿佛是象对待学生似的亲切态度。

又有一次，鲁迅对我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古怪的男子，一有钱，马上就喝酒，花光了，钱没得了，就跑进寺庙去神妙地生活，这中间，一弄到钱，又外出花完去。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颓废的生活。这个男人是日本人呢？中国人呢？不很清楚，是混血儿吧。他这么说，我非常感到兴味，混血儿和颓废倾向相结合，必定是更加耽于感伤的了。我问他，那个人会说日本话吗？他说，讲的非常好，同日本人没有两样。说实话，是当初我们在东京筹备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哩。我再问他是谁，他就说：是苏曼殊。关于苏曼殊，我过去曾读过他的《英汉三昧集》，又从佐藤春夫氏（或者是在佐藤的家里听神代种亮氏）说过一些关于他的话。所

以，知道曼殊是鲁迅的朋友，不禁吃了一惊。我又从各方面询问他关于苏曼殊的事，除了上面所举的不羁生活，以及同章太炎的关系之外，就问不出什么来。他即速把当时刚刚出版的柳亚子编的《苏曼殊全集》五册送给我，他说，你读读它看。《新生》的事，在《呐喊》自序里说过，却没有谈到曼殊的事。又在其他的任何地方，直至那时为止，也未见他写过关于曼殊的事。所以他的友人中有曼殊，使我感到特别的兴味，贪婪地读了《苏曼殊全集》。特别对他的奇特的身世感到兴味，我写了《鲁迅传》之后，又写了《苏曼殊》，送给《文艺》杂志。原稿已经排了版了，但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登出来，校样在许久之后，担任改造社^①《文艺》杂志编辑的高杉一郎，才对我说：“有这个东西。”而将校样给了我。这时我也已同《改造》杂志有投稿关系了。

鲁迅的革命家的热情，同他青年时代所信仰的进化论结合着。在他的思想的根柢里，进化论的信仰是牢固的。要与阻碍人类社会，首先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进行战斗，这支配着他的实际的行动。他曾对我说，至少在习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就是这样的。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战斗就旗帜更加鲜明了。他的人生，是极其具体的，直接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的，是为了生活周围的客观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在这儿有他的一切关心的中心。他是那样地热爱

①日本一个大出版社。该社出版的《改造》，是著名的资产阶级综合性大型杂志。

中国和中国人民。

日本歌人柳原白莲来到中国，想会见中国的文学者。由内山完造氏的安排，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某饭店会面了。我也应邀作陪。在会见中，鲁迅频频攻击中国的政治。白莲先生就问他：“那么，你是讨厌生在中国的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好。”这时，我看到他的眼睛湿润着泪水……

在日常的接触中，从他的言行我感受到，他首先是个爱国者，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异常地强烈。他的目光经常都是注视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考虑如何使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能在未来过最合理的幸福的生活。他对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辛辣的，有时甚至是恶骂的笔锋，实在是他对本国和本国人民的沸腾的爱情的折射。那样地冷彻刻骨的笔锋，只是旁观者是无论如何无法驱使的。他那和蔼可亲的，时常浮着热泪的眼球的光辉，决非展示他对人间的冷酷，毋宁恰是相反的东西。他是任何时候都燃烧着爱祖国、爱民族的热情的。

关于鲁迅，郁达夫曾经说过：“我们只看到一部分的时候，他已看到了全般。当我们焦急着要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未来。”他比诸我所知道的无论怎样著名的作家，都大不相同。他对过去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和锐敏的洞察（例如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关于“竹林七贤”的研究，有谁曾以那样周到和锐敏的眼光来看历史

呢？），同时他的眼光又总是倾注于未来，由此产生他对现实的痛烈的批判和鞭策。使中国的今天新生，是为了使中国的未来永生。他经常都衷心期待着这一点。

鲁迅是怎样遭受反动派的迫害的？

鲁迅是一位伟人。他不屈服于反动权力，敢于与反动统治的压迫战斗。他有不妥协的精神——与反动派战斗到底的精神。在我出入于他家里的期间，反动政府想利用他，当时的行政院长的使者，曾到鲁迅为了躲避通缉而隐居的地方去，传达行政院长想会见他的意思，但是他拒绝了会面。一个市井文人，而且处在被通缉中，断然拒绝了行政院长会见的邀请（行政院长，等于日本的总理大臣，如果同行政院长合作，对他的迫害立即就消除了），由此足以想见他决不屈服于反动权力的坚韧性，使我感到他是何等伟大的人物。

鲁迅的一生，贯串着决不与反动派妥协的、经常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战斗行动。那个时候，由于通缉，他住在某大厦的三楼，为了不让人知道他住在那里，连只有朝街道的一个窗子，他也不伸头出去。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一到休息的时间，我就把椅子拿到窗下乘凉，或者看看街上往来的情景。但他总是坐在离窗户三尺左右的地方，警戒着有人从街道上望上来发现他，他决不靠近窗边。这是何等地不自由的生活啊！但是他一直都忍耐着，继续写文章讽刺和抨击黑暗